



欧亚研究论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



欧亚研究论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研究论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论文精选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45 - 228 - 7

I. 欧... II. 上... III. ①东欧—研究—文集②中亚—研究—文集③西亚—研究—文集 IV. D751 - 53 D7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786 号

欧亚研究论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论文精选

编 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 劳 桂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228 - 7/D · 046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崇 善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之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2003年,为整合研究资

源、加强学术交流,我院先后成立了两个跨所联合的研究院,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前者由世界经济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四个研究机构组成,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为研究重点;后者由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四个研究所组合而成,集中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此外,为了培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大力推进跨所、跨学科的院直属研究中心的建设。截至2007年底,我院先后设立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等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广结学缘,开展富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成为我院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我院拥有2个研究院、15个研究所和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学科门类齐全,机构布局合理,研究实力雄厚。到2007年底,全院在职工作人员81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640人,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94人。

学术研究是我院中心工作,而学术的发展总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五十年中,我院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我院更把健全和完善学科体系视为我院科研工作的重心。目前我院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刑法,国际关系,上海城市史研究,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思想文化等12个重点学科,以及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界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等14个特色学科。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集中体现了我院的研究特色、实力和优势,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回首五十年风雨历程,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尽管有过曲折和坎坷,但总的来说,我们坚持以学术为立院之本、以学术为育人之魂、以学术为强院之路,坚持厚德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发展之路,在不断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自觉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以学者的智慧积极回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问题与挑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累积起可观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一定的地位和声誉,我院因此而成为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成为党和政府充分信赖的思想库、智囊团。

这套丛书以所为单位,每所一本,辑录各所在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册,既是为了纪念我院五十周年华诞,也是为了集中展示我院过去五十年的科研成就。这套丛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我院科研人员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学术之路,凝结着我院全体科研人员在时代风雨洗礼下的智慧和良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的五十年我们在艰难的求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成就、底蕴和传统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将转化为我院全面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五十年中,我院将更加雄姿勃发,灿烂辉煌!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 言

潘 光

本书汇集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及作为其前身的两科研单位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近30年来的优秀成果。

欧亚研究所的前身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于1981年5月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于1987年5月沿革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所,1992年3月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同年11月东欧中亚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合并后,仍保留东欧中亚研究所所名,简称和对外英文名称使用欧亚研究所,院领导决定由原任历史所副所长的我出任该所的所长。

在两单位合并前,原苏东所和世界史中心科研人员已在科研方面推出了许多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中心的强项主要是中东研究、欧洲研究和周边国家研究,尤其是犹太以色列研究,已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同时,中心对世界历史的综合研究也有优势,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中东史、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和韩国史的研究比较强。苏东所的主要研究范围则是苏联东欧,拥有较强的俄语研究力量,还有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语种的研究人才,一直密切跟踪苏联东欧的形势发展,也承担并完成了许多重要课题。

然而,也就在欧亚研究所诞生前后,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首先,苏联解体后分解成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等几个板块。其次,冷战结束后欧洲逐渐融为一体,原来狭窄的东欧概念已不适应这样的发展。再次,曾被冷战掩盖的领土争端、民族和宗教冲突重新泛起,宗教极端思潮和民族分离主义上升,在中东表现最为突出,同时导致了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冲突热点带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新所面临三个重要课题:一是原来的苏联东欧研究必须尽快转型;二是原来的世界史研究要更紧密地与现实结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两个单位原有学术积累和研究特长的主要交叉点,使之成为新的科研增长点。

经过当时所领导班子的反复研究,又广泛征求所内科研人员和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意见,我们采取了几个战略性措施。一是原来的苏联、东欧研究逐步向俄罗斯研究和欧洲研究转型;二是世界史研究拓展视野并向现实靠拢,如犹太研究在保持“犹太人在中国”这个研究强项的同时,加强对今日美国、俄罗斯、亚洲、欧洲犹太人的研究;三是将中亚研究作为两单位原有学术积累和研究特长的一个主要交叉点,努力培植新的科研增长点。第三项措施也许是对欧亚研究所后来的发展最具战略意义的。我们当时的考虑是,从国际关系和欧亚大陆的大格局来看,只有中亚是两个单位在研究领域和地域上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地区:从事中东研究往往涉及中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就通过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在语言上,中亚各民族或是讲波斯语或是讲突厥语,和伊朗、土耳其的联系非常密切;在宗教信仰上,中亚各民族同中东各国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就能源、反恐等问题而言,两个地区也是贯穿一气的。这样一种优势互补的学术结合还有几个有利因素:一是中亚与中东、东亚、俄罗斯、欧洲、美国均有密切联系,还有着丝绸之路这一厚重的历史底蕴,因此原两单位研究中东、东亚、欧洲、俄罗斯、美国、世界史的学者均可发挥作用;二是当时上海在俄罗斯、欧洲、中东研究方面都已有较强的研究机构,但在中亚研究方面却十分薄弱,有利于我们创建“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特色;三是中国与后苏联时代中亚各国的关系迅速发展,“上海五国”机制正在酝酿之中,我们开展中亚研究,也可为国家建言献策,发挥智库作用。

接着,我们便在院领导支持下将犹太研究确定为重点学科,中亚研究确定为一个新的科研增长点,同时努力推进前苏联东欧地区转型研究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欧洲一体化研究和亚欧关系研究,反恐和能源问题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等,并围绕它们设计了一系列课题,使大家能够围绕这些课题共同开展科研,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个新的科研团队。1996年4月,“上海五国”进程在上海启动。我有幸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立即意识到中亚问题有了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研究空间,而且上海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第一次占有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上海五国”是在上海诞生的,又以上海命名。此后,我们便将“上海五国”作为我们中亚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时,上海已形成了俄罗斯研究优势在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以复旦大学为重点的格局,而我们就在这个夹缝中慢慢地把中亚研究、特别是“上海五国”研究的旗帜举了起来。2000年,我们在院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在欧亚所原有的中亚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五国”研究中心。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当天,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作为现场直播的嘉宾主持,向全世界介绍“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背景、内涵和伟大意义。我们中心随即改名为“上海社会科

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专门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学术机构。

2003年,我所犹太学研究被确定为首批特色学科。2005年,经过严格评审,我们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也被确定为特色学科,终于从一个新科研增长点发展为一个优势特色学科。现在,该学科已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亚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具有国际影响。同时,转型研究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欧洲一体化研究和亚欧关系研究,反恐和能源问题研究等也已成为我所又一批科研新增长点。1996年亚欧会议进程启动后,我们密切跟踪,连续承担并完成了关于亚欧关系的上海市和国家级课题,每两年召开一次亚欧关系问题研讨会,并于2004年推出了专著《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在亚欧关系研究方面已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1996年,我们在国内首次承担了福特基金会的反恐课题,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2002年,我们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在国内首次举办了反恐问题大型国际研讨会,目前我们还承担着国家级和部委级的反恐课题多项。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欧亚所的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参与到了这些研究之中,不仅包括了原来两个单位的专家学者,而且还吸收和引进了一些新人,如近年来新进的博士和优秀硕士就超过了10人。可以这么说,通过不断磨合,我们的特色学科、新科研增长点和集体课题逐渐把原来两个单位的人员整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很强凝聚力、浑然一体、没有什么隔阂的集体。同时,全所人员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并肩作战,打造出了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特色学科和学术品牌,为我院的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做出了贡献。

除了团队优势外,我所还有许多具有个人研究特色的著名专家,如赵鑫珊的欧洲文化研究,沈立新的华侨华人研究,汪之成的在华俄侨研究,邓新裕的中东史研究,李秀石的日本史研究,崔之鹰的朝鲜半岛和在华朝侨、韩侨研究等。

本书是欧亚所及其前身近30年历程,特别是上述1992年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取得成果的全面展示,其中既有老专家王志平、朱崇儒、季谟、赵鑫珊、汪之成、邓新裕、唐元昌等人的成果,又有现在担当大任的中年科研骨干余建华、王健、姚勤华、胡键、周国建、姚勤、丁佩华、崔宏伟、虞卫东、梅俊杰、张健荣等人的论文,包括已调离的李秀石、崔之鹰、张和声的论文,还有青年学者孙敬亭、罗爱玲、张屹峰、盛文沁、汪舒明、李立凡、刘锦前、戴轶尘、王震、朱雯霞等人的文章。

需要提及的是,因篇幅所限,沈立新、傅勇等主动提出不要将自己的成果编入,而犹太研究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两个特色学科各自有一本书汇集成果,因此本书

收入的成果相对较少。也同样由于篇幅所限,书中收入的论文比当时发表时大多经过压缩。原欧亚研究所副所长胡士君的成果虽然没有收入,但他对我所科研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全所科研人员永远铭记的。本书的编选工作主要由潘光、余建华、姚勤、李颖承担,另外盛文沁、张屹峰、黄崇峻、刘锦前、张忆南等同志和研究生刘真、龚子亮等为本书的问世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也在此鸣谢。

愿本书能对欧亚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有所总结,并对欧亚研究所今后的发展有所启示。

2008年2月21日

于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

CONTENTS

目
录

序 言 / 潘 光 / 1

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 潘 光 / 3

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 / 李立凡 刘锦前 / 14

民主的普世性与民族性

——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看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 / 胡 键 / 20

浅论美国的“大中亚计划” / 潘 光 张屹峰 / 27

苏联·俄罗斯研究

科技进步与生产效益

——苏联的理论、实践和问题 / 季 谟 / 37

中产阶级与当代资本主义 / 王志平 / 46

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历史回顾 / 朱崇儒 / 51

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及对它的几点思考 / 唐元昌 / 58

旧上海的俄国侨民 / 汪之成 / 65

中国和平崛起与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互动关系 / 张健荣 / 72

21 世纪中俄关系:关于文明内涵的思考 / 丁佩华 / 79

欧洲研究

欧洲一体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 余建华 / 91

民族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 / 姚勤华 / 98

“从魏玛三角”到“波兰现象”

——新老欧洲的利益博弈 / 姚勤华 戴轶尘 朱雯霞 / 106

试析欧美正式盟国关系走向及其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 崔宏伟 / 113

德国民社党(左翼党)的困境和选择 / 孙敬亭 / 120

欧盟反种族主义政策:发展历程与新动向 / 盛文沁 / 128

中东研究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走向 / 王 健 / 139

以暴易暴:巴以恐怖冲突的意识操控及其影响 / 虞卫东 / 146

以色列反恐战略研究 / 潘 光 王 震 / 154

犹太研究

近千年来伦敦犹太社团的沉浮与沧桑 / 邓新裕 / 163

当代美国亲犹太主义的文化根源 / 汪舒明 / 170

试论上海犹太遗址与特色建筑的保护和开发 / 周国建 戴轶尘 / 177

其他研究

后冷战时代全球民族主义新浪潮的若干特征 / 潘 光 余建华 / 187

日朝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 崔志鹰 / 195

从神道国教化到靖国神社

——论日本近现代史中的祭祀政治 / 李秀石 / 201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仰望漫天星斗时的叩问 / 赵鑫珊 / 208

人类文明的结局

——仅仅是为了驱散元(原)无聊或太无聊的一点预测 / 赵鑫珊 / 214

近代以来若干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比较研究及启迪 / 余建华 姚勤华 李秀石
张和声 / 216

朝核危机背后的全球核问题和地区安全 / 姚 勤 / 226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 胡 键 / 234

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 余建华 / 240

亚当·斯密真相辨伪

——意识形态化的弊病 / 梅俊杰 / 247

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潘 光

上海合作组织有利于中国维护周边安全,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对中国的西部开发,而且对中国的整体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促进意义。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其成功的实践和理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周边安全和国际环境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稳步发展,它对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关系的发展,乃至对中国周边安全和整体国际环境的重要战略意义正日益凸显。

(一)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关系

在历史上,中俄曾在中亚多次发生正面冲突。苏联的瓦解突然改变了中亚的战略格局,中亚新独立国家的诞生使中俄两国之间出现了广阔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地带,双方显然都不对另一方构成威胁,而中俄在这一地区的共同利益却迅速上升。这一共同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双方都面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因此需要与中亚国家合作来打击这三股势力,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中亚的稳定;其次,双方都希望通过开发中亚丰富的资源以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及本国邻接地区(如中国新疆)的发展,而这只有通过中、俄、中亚国家的密切合作,并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部资金和技术才能达到;第三,双方都对西方势力,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在中亚的增长感到不安。正是这些共同利益,奠定了“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逐步启动,迅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基础。

在中俄合力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上海合作组织的稳步前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在“上

“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构筑的框架和原则的基础上,两国逐步解决了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俄之间 4300 公里长的边界问题已完全解决。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合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了中俄的安全和反恐合作。9·11 事件发生后,中俄成立了双边反恐工作组,并在塔什干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内进行了有效合作。最近,双方正式建立了“安全问题定期协商机制”,成功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在军事装备和高科技领域内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顺利发展,也有助于改变中俄关系中的一些消极面。如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制约中俄关系深入发展。2001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2001 年 9 月,朱镕基总理与卡西亚诺夫总理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第六次定期会晤取得了重大突破。2001 年中俄双边贸易一举突破 100 亿美元。到 2004 年底,中俄贸易额已突破 200 亿美元。2001 年 7 月 16 日,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个月后,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的法律原则,使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完全平等的,而又不具军事联盟性质的双边条约。

(二)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中亚关系

中国与中亚早在 2000 多年前就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过,到了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中亚的大部分成了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版图的一部分,这种直接联系中断了近一个半世纪。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再次向外部世界敞开大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立即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6 年《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 1997 年《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签订,启动了使中国与中亚国家结合在一个稳定的多边利益共同体内的“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大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关系的深入发展。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框架内,中国与哈、吉、塔三国长达 3300 多公里的边界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也飞速发展。1992 年,中国与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五个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仅为 5 亿美元左右,而到 2004 年,这一贸易额已跃至 50 亿美元,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便超过了 45 亿美元。中国—中亚关系的发展是为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奠定基础的三大支柱之一。反过来,上海合作组织又为促进中国—中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2005 年春以来,新一波“民主改造”、“颜色革命”和“政权改变”浪潮及三股势